

话语套路的语用功能

亚当·沙夫著
周子恒、张碧译

人类行为通常建立于某种动机的基础上。这种说法适用于所有人类行为，但这里我们所关注的东西，使我们忽视了主体（agent）处于病理学状态（广义上的）时的行为。因此，我们不仅对那些严格意义上的疾病患者（例如精神病患者）的行为视而不见，同时，对于那些其精神意识饱受滥用酒精、毒品扰乱之苦的人、那些处于催眠状态的人等等而言，关于他们的行为，我们同样漠然视之。

当然，不同类型的动机，可能在特征、潜在认知因素（我们这里不考虑真实性[truth]价值）和情感因素方面迥然相异，而这些因素通常会共同参与这种动机结构的构建。这种结构非常复杂，原因在于：它们都建基于人类在有意或无意的状况下所形成的价值体系、以及随之而来的行为准则体系，其中，后者包含了社会所公认的人类义务和禁忌。这里，我们不妨忽略所有这些细节和微妙之处（尽管这在行为理论学者眼中非常有趣），而将我们自己限定于某种一般性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即便在做出每个决定前，都早已经过意识层面的深思熟虑，但人类行为的动机依然受制于诸多认知和情感因素。行动个体通常无法完全意识到这些因素，这些因素包括他形成于内心的价值体系，以及经由社会途径而传达的心理图式及话语套路，等等，都会影响他的情感偏见、恐惧和偏好。个体对这些因素的认识越薄弱，它们对理性化的接受程度就越高，并伪装成有客观认知价值的元素，同时，它们对个体的影响力就越强。这正是话语套路的语用功能、及其在语用方面所具有的特殊力量的来源。

话语套路是一种特定的认知结构，这种特定性结合了认知、情感等诸多因素，因此，也是一个特定的语用结构，换言之，是人类活动的基本要素，并因此贯穿于整个人类行为理论中。我们不妨换个说法：话语套路有其认知、情感和语用方面的价值。但我们这里并不在意这些以及其他观点，而是想阐述这样一个事实：话语套路对人类活动具有某种影响，同时，这个事实也可以揭示它们的起源问题。话语套路的社會功能与它们的起源互有联系：社會功能影响它们的起源，反之，话语套路的社會起源也会决定它们在人类社会行为中的功能。下面的分析，首先会阐述话语套路的语用功能问题，如上所述，这种功能与话语套路的起源相比，出现得较早。

众所周知，话语套路必须通过社会途径才能实现向个体的传达，这些途径，主要包括来自家庭的、童年时周遭环境的，以及此后学校、同学、同事等多方面的影响。在童年时代的早期阶段，这种影响的特殊意义在于，它与儿童语言能力的发展是并行的。在牙牙学语的过程中，孩子接受了社会向他们传达的一系列观念，并由此产生相应的情绪反应，这些反应恰恰具有话语套路的属性。需要强调的是情绪与话语套路的关联过程。年轻个体的心智在形成过程中，与上面提及的一系列观念融合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样，他便通过模糊自己天性的方式，极大地强化了话语套路的作用。这种情况，便决定了话语套路对人的社会角色所形成的影响。

我们所使用的**社会角色**这一概念，是由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所设想的。尽管其他作者也曾以别的称谓方式提及这个概念，但在我看来，正是埃里希·弗洛姆为其赋予了最成熟的形式。弗洛姆将人的社会角色阐释为某种总体性态度，这种态度一方面通过社会途径传达给这个人，同时，也控制他对外部刺激做出某种类本能（quasi-instinctive）的反应。这种认识建立在以下的推理基础上：动物的心智结构中存在某种机制，它通过激发动物求生

欲的方式，对外界刺激产生相应的反应，这种机制就是本能。对于智人（*Homo sapiens*）的发展水平而言，为了赋予那些能够做出合理决定的行为以更多空间，在人类生活的某些领域，本能的作用已逐渐减弱，乃至完全消失。这种情况可能带来灭顶之灾，原因在于，人类将不得不面对一些处境，在这些处境中，他们没有充分的时间来应对各种状况，并且被迫做出迅速的反应。这种取代了消失的本能反应的机制，具有一种类本能的反应特征，但这种反应并不听命于遗传密码（genetic code），而是受作用于心理上的文化符码（culture code）控制。这种态度建立在上述机制的基础上，自身就具备了为进行活动所做的铺垫（readiness），从而使人类有可能不通过反应神经（reflection）即做出反应，并表现出类本能反应。这种类本能反应比纯粹的本能反应更灵活，因为它们在适应给定环境方面，总是游刃有余。这种态度与他们的特征融为一体，形成社会角色。

尽管事情远远不够清晰明朗，但很明显，话语套路在塑造人类的社会角色方面，发挥了不可小视的作用。如前所述，话语套路与态度不同，态度是信念（conviction）的基础，为行为的进行做好铺垫，然而，话语套路在态度结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话语套路具有相应的稳固、恒定性特征，从而在一定意义上具备了某种先验性质。它在人类形成社会角色信念的过程中注定起到基础作用，而这种基础作用同时具有类认知和情感属性。人的社会角色，能够保证他的反应具有自动性、相对稳定性、对经验的超越性，同时也能够以某种方式适应现实。话语套路能够完美地满足这些要求，并使人做出类本能活动；但是，在某些不利条件下，或者在某种限制作用下，话语套路同样无法满足这些要求，而社会活动也将随之陷入危险之中。关于自动行为（automatism）与灵活性相契合的形式与机制，依然需要深入探讨，并且从社会心理学领域入手。

在这种机制中，话语套路和价值体系的联系成为了一个开放性论题，而相应的评价标准与准则正是建立在价值体系的基础上。一方面，一个给定的价值体系为行为的铺垫（readiness）奠定基础，这是人的社会角色的本质；同时，这种价值体系也为信念奠定基础，这种信念制约着行为的铺垫，并且是由通过社会性传递的话语套路来提供的。然而另一方面，社会价值体系的形成过程（一个最复杂、且最不为人所知的社会过程）也需要分享以话语套路为属性的信念。这是否意味着，两者之间能够相互作用？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在这种相互作用中，主导因素又是什么？正如我刚才所说，这个问题并无定论，仍需研究。话语套路问题要想获取一个成熟的答案，并以此来应对由它引发的诸多问题，还为时尚早。

如上所述，话语套路的根源受到社会状况的制约，但与此同时，在遵循反馈的基础上，话语套路发挥着塑造和调整这种制约条件的社会功能。由此，话语套路便成为社会整合活动的重要因素，成为社会活动的动机、意识形态的结构、政治活动和政治宣传的形式、社会偏见、人类社会角色，等等。这样，它们将在社会活动领域中发挥重要功能，这种功能通常被分析工作所忽视，这必须归咎于工作中的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研究者从根本上忽视这种功能，主要是因为他们懒得理它。试图从对手的角度出发，来证明话语套路的功​​能，这种方式诚然是一种批评利器；然而，这种批评也可能转而对利器的使用者自身发出攻击，原因在于，没人能逃脱话语套路的影响。但事实上，话语套路的功​​能总是被忽视，却是由于话语套路一项相对较新的理论的提出。因此，让我们大致回顾一下，不同形式的话语套路在社会生活中是如何发挥功能的。

首先，我们必须关注话语套路的整合功能。我们往往将一个群体划分为“我们的人”（our people）和“外乡人”（alien）¹，这种一刀两断的分法，可以追溯到史前时代，其基础在于“我们的人”这一群体的凝聚力。反过来看，特定的社会确保了这种凝聚力，原因主要在于，社会契约和基本价值观的准则，早已扎根于社会成员的内心深处。

在某些条件下，这种划分可能是建立在宗教的基础上，“我们的人”可以指基督教、穆斯

¹ 根据具体语境，后文将该词分别译为“局外人”、“异教徒”及“异族人”。——译者注。

林、犹太教等不同宗教环境中的人。那些不承认本教信仰的人，就成了“异教徒”。语言同样是一种辨别身份的工具，那些不会讲“我们的”语言的人会被视为“异族人”，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与哑巴无异（波兰词 *Niemcy* 在语源上来自于德语 *niemy*，即“哑巴”）。但这些标准、以及与之类似的标准通常都太过广泛，因为它们将不同社群一并囊括在内，这些社群在主要标准（宗教、语言等等）方面能够和其他社群区分开来，但在其他方面，却很难从内化的角度对之加以区分。

如果将界限进一步窄化，就必须考虑许多附加的标准。其中一些标准，每当我们提到它们时，便会不禁豪情万丈，比如我们的祖国；但提及另外一些标准时，即使我们默默无语、小心翼翼地轻轻掠过这个词，在心理分析的意义上，却依然被它压抑得心神不宁。这种情况，体现于诸如“我们的人民”、“我们的民族”之类的表述，它们用来指代那些沉迷于烈酒的人，并且在某些社群内部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被这些群体所采纳。从此，话语套路开始发挥其功能，一旦满足以下条件：认知和情感因素的混合物、缺乏精准性、心理影响的特殊机制，它们就非常适合去完成指定给它们的社会任务。

个体往往以社会性的方式，将某个社会的价值体系、礼仪习惯、行为约束内化于心，这个过程主要完成于其童年的早期阶段。当然，社会化教育的过程贯穿了他的一生：周围的环境影响着他的生活，所在群体及个人旨趣激发着他的精神，等等。但很明显，人在童年时期最容易受某方面的影响。孩子通过语言的习得来吸收社会的精神遗产，但面对这些遗产，尚不具备辨别“哪些是客观认知、哪些是主观情感”的能力。在这一时期，孩子的大脑与他的语言能力共同发展，同时，大脑将相应的情感反应固定于语言之中。最终，这个孩子便会在不加反思的情况下，自然而然地接受外界观念。社会角色对于人性而言，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是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孩子的例子，恰恰说明了人性被自然发生论（*autogenesis*）或系统发生论（*phylogenesis*）视为社会产物的原因。

在成年时期，一个人可以学习一门外语，但是，与他用童年早期时便开始接受的母语所习得的知识相比，后天习得的外语知识总还是有所差别，即使这些知识在形式上已经非常完备。有这么个颇有见地的说法：对外语过分完美的运用，往往暴露出外语学习者的特征。但即使是一个成年人在学习一门外语，他也无法以那样的年纪获得外国人的社会角色，无法真正将外国的社会价值体系、举止和行为/指导准则内化于心。当然，人可以吸收并尝试运用他们的智慧，有时运用得会非常成功，但可以模仿的痕迹通常会很明显。一个新近入教的教徒，通常因其表现出过度的宗教热情而冒犯他人；一个人在其成年阶段熟练地掌握一门外语后，往往因过分计较对外语的正确使用方式而暴露自己的身份；人通常抱着功利性目，刻意地接受另一个社会群体的社会角色、行为指导准则及礼仪规范。当然，在这方面，作为一个新手，他不仅会因举止夸张而冒犯别人，会显得滑稽可笑。这些东西，新手无法学到，主要是因为缺乏一个重要因素，即话语套路。唯有切实地参与到某个社会中去，特别是在童年时期，才能通过社会途径获得话语套路。话语套路很难丢失，却也无法被学到。当然，通过日常生活中的悉心观察，一个人可以在行为准则上或好或差地假扮另外一个人，但就算是在舞台上，出色的演员也很少能够做到这一点。即便是在现实生活中，他们也不过是些演员，而不是他们所假扮的真实的人。

对于文学主题而言，话语套路的整合功能常常被强调。这是一种近乎宗教的功能，它能够在特定群体内发挥凝聚作用。儿童在学习母语的过程中，会无意识地意识到这种功能，成人之后，当他渴望（通常是在意识的层面，尽管有时是无意识的）融入自己的社会或一些社会群体时，这种功能便得以稳定下来。经验性研究往往关注诸如“祖国”、“爱国主义”等概念的内容，更不必说对沙文主义根基的研究。因此，经验性研究能够揭示作为概念和态度基础的话语套路（连同相关的恐惧症、复合体等）。对话语套路的研究，以及对它们认知的分析，尤其是对情感等方面的探讨，对某些貌似高贵而骄傲的陈词滥调而言，是件危险的事。

这就是刻意启用防御机制来抵制这种研究的原因，这种机制就像心理烟幕一样，遮掩住令人不快的现实。这首先适用于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的机制。虽然这种机制旨在保护话语套路不受好奇和制造麻烦的分析的影响，但反过来，话语套路在形成这种机制效应的过程中，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个问题是由埃莫里·波加都斯（Emory S. Bogardus）在其论文中提出的，该文前面已有引用。

在其认知失调理论中，莱昂·费斯廷格（Leon Festinger）提出了一个对理解社会生活有着重要意义的想法，这个想法仍将（可能不是出于偶然）在相关分析中被默默地继承。我指的是在冲突的情况下一个经过实验验证的事实，如果考虑到某些问题（一般是社会问题）中人类的意见（opinion）和态度（在行为铺垫的意义上），和他在实际生活中的情况存在一定的差异，同时，如果前面所说的意见、或者被修改的意见，在不破坏其意识形态载体的前提下，都不符合实际生活的情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为了在思想上避免接受不合适信息，便会建立起心理防御机制。这就导致了一个虽然矛盾，但现实中的确经常发生的情况，比如，某种在智力上明显已经被接受的知识，在感情上却遭到排斥，而且几乎从潜意识中消失，只是因为这个知识未能带来便利。这些情况带有一些精神分裂症的色彩：在同一时刻，一个人既知道、又不知道一件时常发生于现实中的事——尽管这听起来让人莫名其妙。由此，这种情况会逐渐形成某种具体形式的教条主义以及“封闭心灵”现象，亦即对所有争论充耳不闻的状态，正如米尔顿·罗基克（Milton Rokeach）所描述的那样。

所有这些，都形成了理解话语套路的方法的最合适基础，而关于这种话语套路的情形，上文已经阐明。但与此同时，在操作各种有利于认知失调理论、维持“封闭心灵”状态的行为方面，话语套路又是一种出色的工具。这是因为，在回避诸如人生中艰难的现实等尴尬信息时，人的心灵必然依赖于某种其他事物。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没有比基于准先验性知识（由话语套路提供，具有稳定性、对干预性经验的超越性）的防御态度更适合的东西了。

在某种意义上，话语套路如此精确的防御功能，是其整合功能的一个延伸，这种功能前文有所提及。从某种程度上讲，将这两个功能彼此区分开来，是一个抽象的过程，因为它们实际上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但做这种区分，是为了呈现出话语套路功能的两个不同方面，从而有可能把握住它们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中的角色。

意识形态——就这个词诸多意义中的一个而言——指在某种特定的价值体系基础上，诸多观念及其相关态度的集合。意识形态往往勾勒出一幅无与伦比的社会架构，并指出实现这一社会架构的路径。在这种意义上，意识形态永远是对阶级利益的明确表达，以及为完成获得利益的任务而引发的斗争。因此，任何意识形态，都会号召人们为某个积极目标（在实现某些理想的意义上）发起斗争，同时，也可能为消极的目标（从竞争对手的理想出发、并防止这种理想实现）进行斗争。

任何意识形态都具有——而且必须具备的——是它的进攻性和防御性，这也是**任何**意识形态都必然包括信仰元素的原因：如果它主要是为呼吁人类情感和超验主义启示，就属于宗教性质；如果它主要是为呼吁由建基于严谨的科学方法的科学实验所推导出的论点和动机，就具有科学性质。在后一种情况中，如果为了推进科学活动的发展，把一个明确观点中的代表性思想总结出来，而且事实证明，这种为了达到特定社会目标而采取的行动呈现出极高的效率，那么即便如此，感情因素同样是不能被忽略的。这样，如果竞争对手的论点被接受，具有认知失调性质的阻力性（resistance）将发挥作用，这便会削弱一个人的意识形态立场。这也从“封闭心灵”角度为教条主义奠定了基础，同时，甚至与由某个特定群体所制定的教条准则格格不入，该群体是诸多群体中的一个，尽管其成员自诩具有彻底的“科学精神”，却是个带有准宗教色彩的集体（从涂尔干[Durkheim]的角度来讲）。这种事情早已发生过很多次，时至今日，却依然可以看到。它们不仅在宗教的、保守的意识形态氛围中发生，甚至在革命的意识形态氛围中也时有发生，而这种革命意识形态居然还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我们

可以举出不少西欧的教条化马克思主义团体的例子。在四、五十年前的经典共产主义运动中，这种现象更是屡见不鲜。即便如此，这种现象同样会发生于当下，不论是在整个政党、还是在很多政党所谓的正统（即独断而保守）派别中。接着，我们要处理一些在认知失调情况下产生的、精神分裂症的典型症状。努力的工作，却往往使某些人明明了解某件事，却对它的重要性视而不见。

在每一种意识形态中，都存在比例不断变动着的非理性和自我献身的（voluntarism）情绪因素，因为如果不结合这些因素，意识形态将无法对其追随者施加影响。在这里，我们必须研究一下意识形态和某些话语套路的结合关系。这两者的作用是互相影响的：处于话语套路影响下的思维，能够强化意识形态的防御功能；在意识形态影响下的思维，有助于思维中话语套路的萌生和定型。这是因为，除了处于话语套路影响下的思维，没有其它东西更能够使一个人的思想免受其他意识形态观念的浸染。话语套路是如此的超脱于经验数据，同时，又具有如此的稳定性，以至于使一个人的思维封闭到对反对者的意见充耳不闻的程度，这样，这种意识形态便占据了他的整个意识。另一方面，任何意识形态，都通过设置灵活的认知失调机制的方式，强化某个人从话语套路的角进行思维的倾向。如果我们考虑到意识形态和话语套路之间的相互结合关系，我们会立即意识到，话语套路是政治冲突中不可或缺的工具。政治功能，是它们的另一个重要特征。

学界关于政治语言的研究尚未完成。话语套路在这种语言中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与政治学相关、尤其是与某些政治语言相关的研究文献日渐增多，但它们只是研究了这个领域的某些表面现象，与经验性研究相比，它们更加倾向于推理性的理论思考。需要完成的，是从经验的角度，对当代重大政治事件中的政治宣传语言进行研究，并借此发掘宣传语言中话语套路的功能。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从纳粹领导人的著作中找到难以想象的宝贵数据，其中，希特勒在《我的奋斗》（*Mein Kampf*）中，甚至以理论专章的形式讨论了政治宣传语言的功用。这一章的字里行间充满了愤世嫉俗的情绪，作者对心理学知识的透彻理解，以及大众宣传机构通过大肆宣扬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话语套路而营造的效应，都使得这一章极为撼动人心，当然，希特勒并没有按那些话语套路的名称称呼它们，而是以一种非常清晰的表述加以称呼。在政治天平的另一端，我们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宣传材料中也找到了宝贵的资料。从政治领导人的著作，到各式各样的政治小册子，里面充满着大量话语套路，其内容遍及阶级斗争、阶级敌人的形象等诸多领域。从民族话语套路中，同样可以发掘出不少内容，尤其在涉及到那些受历史影响的敌对情绪时。

经验性研究包括两个途径：首先，分析政治语言的来源；其次，在当前特定环境下，分析不同人群对以话语套路为形式的刺激的反应。经验性研究将这两方面的分析结合起来，必将为我们的学科增添许多新的知识。然而，在对政治的本质、及其务实性目的进行理论反思的基础上，问题的实质清晰地暴露了出来。如果政治指的是那种旨在通过影响行政的运作，来塑造社会生活的人类活动，那么以下情况便是可以理解的：政治意味着为争取这种影响力而发起的斗争，同时，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中，存在着各种反映不同阶级的利益、志向的政治理念。表面上，这种斗争的形式，往往体现为个人或政党之间为权力斗争（为议会席位、公共行政工作的职位、组阁权利等等）而产生的冲突。但从更深层次——也是最重要的方面讲，斗争，是为了明确的概念和观念赢取胜利，因为通过提供人类选择的政治动机，正是为了获取不同目的的、决定性的政治胜利。显然，这不是一个“纯粹”的思想领域的斗争，因为对现实的干预性、实际性思考，总是可以证实或证伪某些观点，但是这些观点仍然会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并且在某些情况下起决定性作用。这种情况是可能发生的，尤其是当他们的提倡者通过扩大一个主张不合理信念和观点的心理机构，由此使其成功避开理性观点、和可能存在的证伪时。话语套路正是在这个关节点开始发挥其效果的。

对于政治首脑（无论是一个个体还是一个政党）而言，都应当明白这样一个道理：不论

是无心插柳、还是有意为之，一旦他的对手成功地化用了真理，那么这位首脑便离被击败不远了。一个人投身于政治斗争，为了使群众信服于他的观点正确性，他首先必须使人们相信，为了成功捍卫大家的利益，他将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其次，向大家做出担保，自己的倾向、态度至死不渝，这意味着使人民免于接受外来意识形态的影响。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使自己在专业人士、知识分子的精英圈子、以及普通大众中的政治影响得到扩大，他必须寻求一条途径，不仅能直通人的思想，还能打动人心，控制他们的感情；一旦取得民众的信任，便总能控制民众的感情。从知识的角度讲，这个过程并没有模式化；但从务实的角度看，这却是投身政治最有效的途径。当人民群众普遍处在沮丧的氛围时，法西斯主义、尤其是纳粹主义便打着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旗帜，巧妙地操控着民众的情绪。只需看看这个例子，便可知这种途径是多么行之有效。在前纳粹德国，社会主义运动未能获得民众的拥戴，并由此展示出当一个人不理解某些东西的时候，他便即将失去的这些东西。如果要使用一个具体的专用名词，重点在于巧妙地处理话语套路，也就是说，去构想（或建构）它们，并通过宣传手段，让它们为民众所熟知，然后，在拥护者中间建立一种特殊的纽带，借此去利用他们，好像在营造一种宗教氛围一般，并通过封闭他们的思想，使其无法接受来自反对者的观念。这些做法，既不优雅，也不迷人，但一个人必须认识到这一切，唯有如此，才能至少具备一点基本的应对和预防能力，以此巧妙地应对宣传的思想浸染。无论如何，在这种情况下，宣传和反宣传都呈现出有意操纵行动走向的特征，这便涉及对形势的科学性审视。这也是政治在实施的过程中，应当将以科学为基础——或者说依赖于科学方法——作为必需因素之一的原因。

现在，我们已经单独列举出了话语套路的四种语用功能：社会整合，防御，意识形态的构建、以及服务政治。它们之间互有关联，同时又保留了各自的独立特征。**遮蔽社会事实**，是这些功能能够发挥的共同作用。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将为我们对话语套路语用功能的思考做个总结。

问题已经被简化为这样一个话题：人类的行为动机，尤其在政治政策的范畴中，总是合理的吗？谈到“理性”这个概念，我们这里用它指代一种动机。从因果关系的角度，来反思人们朝着既定目标而奋斗的过程，同时，这种反思还伴随着一个附加条件，亦即事实必须建立在经验性基础上。我们所说的动机，正是由这种反思派生而来。谈到“非理性”，我们这里指的是那种由情感因素导致的动机，在考察人们朝着既定目标而奋斗的过程时，它不考虑逻辑的因果关系，它根据事实所总结出来的认识，不以经验性的、而是以超验性的资源为基础，由此得出的结论，可能会与从经验出发而得到的结论相距甚远。这种超验性资源体现为宗教信仰与神秘主义启示，同时，也包括各种教条主义中的“老顽固”和“狂热信徒”，他们往往对实际情况置若罔闻，通过认知失调的防御机制，将自己封闭在虚构的意识形态世界中。

这也足以反映出一个事实——与那些大行其道的、将这些问题神话化的做法相反——人类行为的动机，尤其对于带有社交目的的大众运动而言，不但并不总是合理，而且恰恰经常不合理，仅仅是在某种意义上，它们产生于一种由理性和非理性因素共同构成的特殊混合体。通过群体心理学，以及通过对那些故意挑起、控制群体运动的行为（尤其是政治性行为）的观察，都可以证明这一明显事实。因此，我们指的不仅是歇斯底里的大众示威活动，这种活动基于非理性的动机，而这种动机则源于宗教信仰，同时，也源于自然灾害时期由社会解体所导致的精神恐惧症，如抓捕女巫时期的群体性歇斯底里、儿童十字军东征期间的精神病、大瘟疫年代道德原则所遭受的无情破坏、以及当下伊朗穆斯林的宗教狂热，等等。同时，我们也指那些显然不道德的群体运动，带着愤世嫉俗的情绪，它们故意唤起、煽动、控制民众，例如希特勒建立在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基础上的纳粹主义。不幸的是，即使在那些以科学理性思维为指导的群众运动中，这种现象依然存在：我这里指的是当代极左运动，有时指马克思主义，甚至指经典共产主义运动的飞地宗派主义（enclaves of sectarianism）和教

条主义，以及更糟糕的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这些活动通过将非理性主义引入社会运动的动机基础的方式，一味模拟那些被正式接受的意识形态。因此，我们必须研究这些危害甚广的现象，它与社会行为之间的关联同样十分危险。

在上文我们提到的例子中，我们将重点放在了具有非宗教特征（根据它们十分明显的环境）的运动上，同时，在基于科学基础的理性思维和规划的原则的指导下，我们将对非宗教运动的研究提升到对政治运动的探讨。在这些例子中，造成偏差的原因是什么？采纳非理性动机的原因是什么？它的运作机制是什么？其认知和心理的途径又是什么？

在分析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借这样一个类比问题来加以解决：什么是客观性认知，什么是主观性认知。人们往往认为——特别是在他们希望借助科学思维时——他们的认知是纯粹客观的，他们并不打算简单地拒绝那些彻头彻底的主观主义认知，而是准备将这种认识方式完全消灭。然而，一个对此问题的更加深刻的分析表明：一旦考虑到人的认知装置（apparatus）的本性、特别是认知过程的社会条件时，那么，所有认知都同时具备客观性和主观性的双重特征，只有在我们认识到事物的实际状况时，才能消除主观因素。

在人类行为的理性动机中，同样含有非理性因素。它们的起源各有不同，视情况而定，但都与人类生活的情感方面息息相关：从包括潜意识在内的独立心理状态（不同类型的情结、与恐惧相关的个体创伤，等等），到社会心理学，尤其是由作为偏见形式的后者（种族、国家、宗教等等）所发起的各种示威、并以话语套路来思考的方式，都足以证明这一点。

我把偏见与话语套路分开来谈，因为我同意阿尔伯特（Allport）的看法：这两个现象相互联系，但彼此不同。话语套路总是在偏见的结构中出现，但它们并不总是具有负面特征，所以并不总是会导致偏见。然而，很难高估话语套路在人类行为动机中发挥的作用：意识到话语套路存在、并影响着人类行为的人越少，这些话语套路发挥的作用就越大。例如人们常说，“爱我家园”、“爱国主义”、“我们民族永远的敌人”、“阶级敌人”、“我们神圣事业的最高价值”，等等；然而，他们不光使用这类表述，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做出相应的行动。他们相信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并且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去消灭和杀死自己的敌人。催生这种行为的动机是什么？毫无疑问，这些设想（formulation）指涉极为重要而完全理性的认识，但同时，这些设想也指涉话语套路、及后者的所有负面属性：信仰基于情感，往往与事物的真实状态不尽一致，或者至少扭曲了事物的状态，自打诞生之日起，这种信仰便一成不变、刻板僵化，同时根据人类的情感诉求，而对人类心理施加强大的影响。一旦被心怀叵测的政治家所掌握，信仰无疑会堕落为恶劣的武器。激发庸众们的狂热情绪，怂恿他们做伤天害理之事，甚至致使他们犯下滔天罪行，这种事情并不鲜见。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这种事情都极易发生，因为所有这样的设想都同时包括客观性认知因素、以及情感因素，而它们在意识或无意识的层面都具有主观性特征，原因在于，这一设想既是一个概念、也是一个话语套路的名称，两者相互交织，彼此渗透，很难将两者一分为二。这就是一种话语套路可以寄生在一个概念中，在茁壮成长的同时，将自己伪装得天衣无缝的原因。这种话语套路固然危险，但也是在社会范围内化解危险的关键所在。

本文原题为“The Pragmatic Function of Stereotypes”，原刊载于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ology and Language*, No. 45, 1984, pp. 89-100.